

政策導向，避免微管 2015年4月20日信報

亞洲的大學重視科技教研，卻少有把科技政策列為研討專題。此類情形，香港尤其明顯，因為本港甚至並無科技政策。香港教育機構運作精緻細密，前景迷茫也迷糊：中、大學生不必學歷史、社會重學位不重學術、重英文輕中文又不重文以載道、重規管不重突破、...，都是因為缺少遠見 (leadership) 所致。

另舉一例，港、台同文同種又地理位置接近，本港卻沒有研究台灣的專家。林百里與馮明珠都是赴台留學，在創新、創意領域著有成就的港人，前者為高科技界首富之一，後者則為現任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我試著問過成百上千的港人，卻幾無人聽聞兩者之名。至於像崔琦與高錕等香港長大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台灣恐怕比在香港更受注目。此外，香港沒有研究一衣之隔的大陸的權威學術單位或者學術專家。凡此種種，你說奇怪不奇怪？

美國經驗，香港借鑑

當今製造業回歸美洲大陸，香港以製造業外移為藉口，學生不重視也不願意選擇科技學科為專長，其最平常的解釋就是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而家庭不支持的理由，不外香港沒有市場、製造業萎縮、...、等等，把今天的香港推向單一的經貿專業，並不健康。

當大家全力把就業市場的餅做大、做得更有內容的時候，香港政府卻過分擔心畢業生的出路，盯住 employability 的口號，以傳統的賬房手段處理教育問題。這種被動式的執行方法，違背創新原則。雖然口中喊著扶持創業，卻總是綁手綁腳，眼見貧富差距擴大，沒有對策。

香港財政充裕，未必要汲汲於回收快、劍及履及的短期投資。我們要有危機感，執行無形的 (intangible) 中長程計劃。如果教研創新不能植根香港、貢獻世界，則與新加坡與南韓相比，「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哪有資格談高教國際化？

創新是個香港有待突破的阻礙，要先從政府改造 (reengineering) 起步，才能具體發揮在官產學研四方結合的正面功能。

政策與市場導向

從成功的例子來看，無論是高等教育、科技發展，皆從屬於政策導向。就教育而言，政府在政策制定之後，就放手讓各級學校經由市場機制，自行發揮。不此之圖，若是只靠龐大的人力物力，堅持微管，則違反現代經營管治的原則，成效必少。

就科技而言，發達領先的美國，得利於其前瞻的政策。哈佛的 Branscomb 曾經指出，美國的科技政策奉行四個基本原則：

1. 基礎科研最終產生新技術、新產業；
2. 聯邦政府必須為滿足某些特定國家目標的需要，積極探索發展新技術；
3. 政府不會透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從事特定商業技術的開發或幫助指定企業；
4. 聯邦政府的任務，在於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並在必要時指導企業投入的方向。

以上原則，導致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創新與高等教育的巨人，可以一體適用於香港。

制定高等教育的政策，政府至少可以把結餘下來的國防支出，投入教育、科研、產學規劃。在策略性的投入之後，社會或企業的發展，自然會跟隨政策性的走向而運行。大家尊重專業治校，避免干擾，少插手運作細節，促使大學發展健康的心件，追求學術卓越的氛圍，讓學術回歸學術，教研回歸教研！

結論

筆者於去年底的年假中，為信報纂寫「香港高等教育如何走出去？」，共 15 篇。此文為最後一篇。如果能做到以下三點：

1. 提昇教研投入，自由競爭，促使高教生根香港，擺脫殖民地舉步不前的過時心態；
2. 參考美國高教，檢討現行高教的執行方式，優先剷除利益衝突，傾斜撥款；
3. 政策導向，專家掌舵，以創新為主，遠離微管與納管（nano management）；

則香港今天面對的許多茫然問題，可以迎刃而解。